

# 如何提高年鉴的存史价值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勇访谈录

彭勇,河南省夏邑县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明清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其边疆历史问题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著有《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等。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各1项。他在学术研究中注重使用地方志书、年鉴资料,对此颇有一些心得体会。围绕史学界对年鉴基本功能的认识,探讨如何提高年鉴的存史价值,本刊编辑日前对其进行了采访。

**本刊编辑:**您长期从事史学研究,偏重在明清史方面,而年鉴是我国近代才开始兴起的,是什么缘由促使您开始接触年鉴?

**彭勇:**我一直从事历史学研究,而专业是明清史,最近20年还一直做有关北京史的研究。我的两部专著《明代班军制度研究》和《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都是以北京为中心,从明代延伸到清代。在进行研究时,需要大量阅读地方志,尤其是比较集中地阅读北京的地方志。年鉴在我的研究中用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这许多年在中央民族大学还要从事教学,指导学生做课题,当然还要为社会服务,就会去翻一些年鉴。研究明清史、北京史,就绕不开中轴线“一城三带(指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建设好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文化带)”。其中一条中轴线及大运河、长城的两个文化带,我参加过一些论证,也参加过一些调查和研究。另外,也做过北京城内一些历史文化的调查和研究,如此就会去翻年鉴,所以有一些心得和体会。我在读年鉴的时候,首先还是心存感激的,因为如果没有年鉴提供的资料和丰富的线索,可能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会面临很多困难。

过去几年,我也参加过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对今天的地方志工作多少了解一点,其中也会涉及到年鉴。在和年鉴同仁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说,可能你们研究历史的人不大看年鉴。我说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也看,主要是看研究哪一段历史,如现在研究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公共史学的、开展田野历史调查的学者都会看,通过年鉴可以找到不少的学术信息和线索。当然,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学者也是要大量翻看的。

**本刊编辑:**您认为目前编纂的年鉴其基本功能最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彭勇:**首先要充分认识年鉴的存史价值。结合我自己和地方志工作者的交流,还有参

加地方志会议的体会,我查找了近几年编写年鉴的两份纲领性的文件,一是《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二是《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两份文件关于年鉴的规定合起来字数不多,年鉴编纂方面的人员应该好好地读一读,对比这些文件会有很多启发。比如,《规划纲要》几乎在有关年鉴编纂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都有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年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年度为单位。在年鉴的编辑说明中,几乎都写一句“它是以前年度为单位,为保证它的连续性会适当地去追溯一下”。首先,年鉴的两个基本维度或者说它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时间性,即历史性,二是空间性,或历史地理。年鉴的“年”是时间概念。历史如果说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年鉴就是非常清楚地定义了时间和空间。其次,年鉴集辞典、手册、年表、图录、书目、索引等各种形式,跟很多资料性工具书有很多共同和相似的地方,有交叉的地方,但年鉴又是综合运用了这些形式。如大家普遍使用的索引、文摘、指南和便览等,要提供全面、真实、系统的资料,就特别强调它的属性是“资料”。要求年鉴存史价值的高与低,是根据资料的属性确定的。

在没有年鉴的时候,我们要查阅一个地方的材料,即便到近现代,也必须大量地翻阅当时的报刊、档案、笔记、游记、家谱等。而目前,年鉴工作从高校到图书馆,各个单位都在编纂年鉴,我相信在未来10年、20年,很快会整合起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是一个趋势。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做民间文书资料库,国家社科基金所立的重大课题基本上都是与资料库相关的课题,这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新的动向。年鉴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料和资料线索。

做史学研究要使用志书、年鉴资料,因为听到的口述资料如果没有文献资料去佐证,我是不会把它放到正文里作为一种重要证据的。像研究长城史,我会把关于长城地区的资料尽可能都收集一遍,但这些资料必须得多层证明,准确了才能写入文章。如为什么要在古北口、喜峰口布重兵,到那里可以看见地形和地貌,这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但不能把这种感觉写到论文里,需要在志书、年鉴等资料中找到能够提供支持的资料。

**本刊编辑:**我国是修史编鉴的大国,年鉴蕴藏丰富且有价值的史料,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和充分利用。如何重视年鉴的史料价值尤为重要。

**彭勇:**中国修志的传统历史非常悠久,讲历史常会讲史料的链接,其实史料有一个逻辑链在里面。地方综合年鉴属于地方志的一部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里定义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一是强调了年鉴的资料性,二是强调了年鉴的文献性。年鉴编纂应做到观念正确、框架科学、资料翔实,就要深刻认识到“我们存在的世界是立体画而非平面图”,应妥善处理总体和局部、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因此,既要注重从微观上探求,使史料逐渐趋于细化,也要在宏观上把握,将其放在历史的整体背景中去考量。

在年鉴史料方面,需理解“史料”链接中“年鉴”的角色。年鉴是每年编写一次,上一个自然年度结束,下一个自然年度开始编纂出版。中央民族大学编纂《中央民族大学年鉴》,每年组稿时,都会给各部门、各单位发通知,要求交的材料列得很清楚。材料交上去之后,如果能够审核一遍,会保证它的准确率更高,如果涉及某些单位比较重大的事项,这

些单位有审核制度,再予以修订,可能会更好一些。

地方志书记载各个地区内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历史、技术等各方面的资料。给历史学专业的同学讲课时,一定要带他们去读地方志书。在读他们家乡志书的时候,选一部体例比较成熟的文献,再与最近几年当地的年鉴对比,看明清时期历史遗迹或文化遗产是如何被提及的,这是从事田野调查、从事实际训练时必须掌握的两条线,即一是阅读当地的地方志书,看历史中是怎么记载的,二是看它今天存在的状态,去田野实地看。地方政府对于所管辖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我们理解历史的诸多层面之一。如果把它们连起来,就会发现年鉴编纂其实和古代的史学传统非常相近。中国古代有一种重要的史学体裁叫实录,留下来到今天的明、清实录最全。每朝都有国史馆,其中实录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史馆。现在各个单位编纂的年鉴,就是一种类似于古代官方机构来修的正史类别。如果从史料的链接上来讲,每年编纂一本年鉴,若干年以后修志,就会成为地方修志时最重要的材料,尤其是编纂新志或者是续修志书,年鉴就为其提供最重要的“史料”支撑,也就构成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史料。

与政府机关结合更紧的是综合性志书、综合性年鉴。我翻过《中关村年鉴》,里面讲到“三山五园”办公室。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是指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五园是指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这个办公室自己也编年鉴,如再过30年、50年,研究机构改革、区域管理和治理的时候就会留下宝贵的资料。又如,北京现在已经没有崇文区和宣武区,每一个地名的增加和产生都有一段历史故事,如果想找一下它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到哪里去找?有一个方法,就是到年鉴里边找,至少在大事记里撤掉了崇文区和宣武区是会记载的,然后再进一步去查关于两区撤掉的论证,就可以在研究的时候说崇文、宣武的历史到此结束了。

编年鉴的时候,大量提到“年内”,一部年鉴会有很多“年内”,感觉像各个部门的总结,可能读起来的时候,在时间点的定位上还要继续再找,一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年鉴具体到每一年的时间点,在地方志书中可能就会更概括。原来修志书,一是抄旧志,二是根据现存的政府档案和材料来进行编写。所以有可能会缺失很多材料。但有年鉴之后,对我们今天精准化地去研究和理解就非常有帮助。

做历史研究时可能会长篇大论,会去评议它的优劣得失。可是年鉴不允许存在大量议论,这也是在编纂原则上特别强调资料性的体现。像有些内容可能还要特意标出“为了传达XX精神要求,最终达到XX目的”。其实,中国古代在做史料整理、修志、出实录的时候,都把原来大量的政府公文和档案,砍头去尾,保留记录最核心的关键性问题。年鉴也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如《明经世文编》及清代的“经世文编”是它的资料性作为最核心的问题。毫无疑问,年鉴首先是资料,但也应兼顾学术性。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后,又形成一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称为《四库全书总目》,总共收录11000多种书,其中刊刻的只有4000种,另外还有7000多种被列入存录和禁毁,只以“提要”的形式保留下来,并专门列了一目叫史评类,专门评论各种史学著作、史学理论,就是对学术性的一种体现。

**本刊编辑:**年鉴事业面临新的创新发展,年鉴资料和编纂内容又将如何从资料积累、

信息汇集层面提升到存史层面,从而体现史料价值,其学术价值又应该怎么体现?

**彭勇:**精品年鉴和非精品年鉴区别在哪里?一部精品年鉴体例要严谨,内容完整,首先是受体例的影响,所以年鉴的体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年鉴质量的高低,体例是非常关键的,它是纲领性的。每部年鉴的体例可以不太一样,如果体例要大动,还要与前几卷年鉴保持连续性,那么如何改变和优化就成为重要问题。在保持体例严谨的同时,可以做一些必要的简要说明,可以采用加按语的形式,或者是在每章加编者按的方式,适当补充说明。这些按语可以告诉阅读者,它不是年鉴资料的正文,只是介绍这一次做了多少改动、调整,有哪些变化,就体现哪些变化。目前我们所看见的年鉴大部分只有编辑说明,而且都是仅一页到一页半,两页的都不太多,都是比较短の説明。高水平年鉴的体例都是很科学严谨的,并且能体现编者的思想。编者的思想不是在正文里体现,而是通过编辑说明等体现。如《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中就强调,年鉴框架应保持相对稳定。年鉴的框架要保持相对稳定,但可以根据年度的特点和变化做适当的调整,不断优化。一些行业性年鉴可以把框架相对统一起来,不仅仅是自己的框架能够保持稳定,同类的、高校的也可以有一个相似性的对比,大体一致。《中央民族大学年鉴》《首都经贸大学年鉴》等高校年鉴的体例差别就很大。所以,行业内的年鉴保持一种相对的统一是很有必要的。

年鉴资料具有存史和资政的价值,所以在资料记载上要注重准确性。我研究明清时期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防御体系就会读北京的地方志书、年鉴等资料,它们能够提供概括性、准确性的内容。综合年鉴内容应存真求实,客观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而年鉴资料一般由各地各部门汇总报送,而后需要编辑成统一的数据资料。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为准,未列入统计范围的,应以业务主管部门提供的为准。当数据不一致时应加以说明。不同部门有归口管理的单位,统计数字有统一的标准,相对来讲是专业的和准确的。

年鉴的史料价值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像“一城三带”作为北京市文化建设中的重点任务,是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与保护的重要规划,反映城市规划和发展理念,在年鉴中有较好的体现,查相关资料时就要对其横轴线、纵轴线,还有三个区带进行收集。比如,查找大运河北京段的遗产点会发现没有特别知名的,但历史文化价值都是世界级的,它的规划和保护情况主要在元代,明代提的较少,但明代的历史文化遗产,一直到今天均还存在。因为明代朱棣迁都北京,要重新修大运河,放弃元朝时期的海运,重新又启用旧有的大运河河道。所以,整个明清五百多年北京城这一段的大运河,都是非常繁忙的物资和人员交流的通道。在年鉴资料中就需查找北京每年推进“三个文化带”做了哪些工作。通过年鉴可以发现,北京市提出“三个文化带”之后,各区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情况,很快可以从年鉴每一年做的工作里列出来整体的推进情况。我作为《中国长城志》民族卷和文献卷两卷的副主编,这项工作做了十几年的时间。前几年出版的《中国运河志》和《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这种庞大的文献资料工程需要整理历史时期的全部资料,要把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料梳理通透。

我们学校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在研究本地的历史文化遗产时,我也会特别提

醒他们要去看当地的年鉴。比如贵州的梵净山是以皇帝的名义赐匾额的重要宗教场所,是多元宗教长时间发展的区域,它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丰厚,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之后,去那里旅游的人多了。把它作为课题时,要研究当地历代的地方志和它的整个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论证报告,并要实地考察。从动议的提出、地方的论证、省政府的申报,甚至国家遗产研究院对其进行的论证,以及整个文本的产生,都要在视野之内。虽然档案资料都能够看到,但是可以根据年鉴记载推进整个工作的情况,推出政府的观念和行为以及他们对于梵净山的理解。同时还要进行大量的调查问卷,了解游客知道梵净山的渠道,为什么到这儿来,印象相对深刻的是什么。调查当地周围的居民,包括老人、小商小贩、普通居民、采访外出打工回来人员等,了解不同群体眼中整个梵净山区域的变化情况。走访后发现,政府和当地老百姓的满意度都很高。对比清东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是有一套很严苛的管理措施和规定的。几年后,当地的老百姓和管理者发现存在很多问题,这就是申遗成功之后给他们带来名声上的提升,但实际上他们更多想的是如何利用它和提高经济收入,以致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如果有可能的话,连续追踪几年进行记录,这是社会学或民族学的记录方法。

中央民族大学在青海省有几个村子有专门观察点,已连续观察多年。每年暑假到那里做访谈、记录,看他们的整个发展演变,和当地政府去交流,我们作为一个观察者,以年为单位忠实地记录它的整个变迁过程。这也像年鉴工作,因为年鉴也是忠实地保留这一年一定区域内的发展变化。

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通过做一些课题,指导学生利用年鉴去查资料,历史文化遗产方面的材料用的会相对多一点。至于其他方面,比如像研究教育史的,教育资源的投入、教育的平衡、校园的发展规划等,就要查另外年鉴这样的专门资料。

**本刊编辑:**所以要提高年鉴的内在质量,使年鉴拥有更多的读者群,也使年鉴能为今后的修志积累更多、更详尽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要充分发挥年鉴收集保存地方资料的作用。如何提升年鉴的资料性以及与其历史研究的关系,翔实、准确地保存重要资料以备查考引证,以助编史修志,就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年鉴工作者面前永恒的话题。

**彭勇:**我作为年鉴的阅读和使用,主要是从读史和研究历史的角度来谈一些想法。若要提高年鉴的史料价值,对于史料就要求它的真实、全面、客观性,我们希望提供的材料适当多一点,内容相对丰富一点,材料多了就会有取舍的空间,可以了解的信息也会更多。研究历史,时代越久远,不管是真的信息还是假的信息都有它的价值,这是从认识历史的角度来讲的。但从编纂年鉴的角度来讲,既然它有存史的功能,无论是对现在还是对以后,它也会有资政的功用。读史以史为鉴,这是历史研究者和读者的心得。对现在的读者来讲,它是一个资料性的工具书,需要阅读使用时,方便查找。

拿到一本书,如何快速地了解、知道该书的编纂思想,这是非常关键的。作为一个读者,拿到地方志书一般最先翻看的是凡例。一本年鉴首先打开的不是目录,而是它的编辑说明。年鉴的编辑说明相对简短,它的编纂思想一定要有充分体现。如本年鉴设有18个类目、32个类目,或者是本年鉴的内容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等。

我们讲年鉴内容的设置,特别希望编纂者能够在编辑说明里对一些体例进行具体说明。体例的具体说明,体现的就是编纂思想。现在年鉴的编辑说明类似地方志的序,地方志的序言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是在序中将编纂源起、编纂思想、编纂过程、编纂意义及价值体现出来。对阅读者来讲,可能最先阅读的都是它前面的序言和编辑说明,或是凡例。我每年会带学生读几种重点文献,去读实录,训练他们学会读凡例。比如,《明实录》的凡例有几十页、上万字,其中就会提到需要编纂和书写的基本条件和标准。而年鉴在编辑说明中只有年鉴的主要内容,关于记入年鉴的条件几乎没有提到。《北京年鉴(2018)》的编辑说明写道“本文中除民主党派之外”,对关键词和核心词进行标注,也是做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规范。在编辑说明中对一些新词和核心词做一定解释是有益的。现在很多年鉴都设索引,索引在关键词的选择上哪些入、哪些不入,在编纂的时候有一定的通行标准和要求。对于历史研究来讲,关键词是很大的一门学问,我们所设的词,综合性的年鉴或者专业年鉴能不能有一个规定或者规范统一起来,是值得考虑的。

高校年鉴的编纂原则,是以学校为单位汇总各个部门的工作概况,以及大事、要事、新事、特事。《中央民族大学年鉴(2016)》在编辑说明中记述整体条目设置情况,使读者准确知道该卷年鉴主要是按照职能部门和机构设置的。除“一般情况”,还规划总结年度情况。对比《首都经贸大学年鉴(2018)》和《中央民族大学年鉴(2018)》,会发现这两部年鉴明显区别是它的学院工作类目。

《中央民族大学年鉴(2018)》编纂是根据职能部门的归口管理来收集、汇总材料进行编纂,没有分学院的工作,在学校层面有各种统计数据。现在数据化管理或者是大数据平台越来越发达,每年不需要再报招生、毕业生、授予学位等情况,甚至开设的课程、获得奖励,以及申报的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课题,因为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都已经有了相关数据。需要我们报送的就是各个部门自己开展的工作,比如当年有多少老师发表文章,科研系统会统计出来,而我们的交流访学这一块相对来说就没有数据,以及我们认为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双一流”建设能够引起互动的数据没有体现。

《首都经贸大学年鉴(2018)》的部头相对大些,除职能部门外,还有详细的学院工作、“双一流”学科建设的指标等材料。有专门的学院各方面工作的类目,可以掌握各个学院的年度工作进展情况,其实各学院的职能部门对应的是该学校的职能部门。这两个学校的体例都是按照职能部门来分,但是在内容的设置上能看出是利用何种方式收集信息。

地方综合年鉴有一些高度的相似性,因为它是地域性的,像部门、机构、行业、组织可以适当结合本地的特点做一些微调。现在很多单位也都鼓励大家去做一些调研,地方志工作机构也可以组织高校系统、行业系统、档案系统做一些专题调研,大家能够统一起来,发展成教育、煤矿、盐业、银行等系统的专业年鉴。我问过焦作煤矿系统的同学,他说他们单位就他一个专职人员编纂年鉴,每年编一本,他也进行过很多调研,去论证煤矿系统如何编写相关条目。在这样的一个体例中,可能因为我阅读过一些材料,读的时候不了解它的具体意思,就希望能够在编纂的时候加一些简洁的说明。像前面讲到的“年内”,大量的都是今年之内做了什么内容。这个“年内”的工作和工作总结的相似度非常高,如果使

用的话,它的资料性不是特别强,可能就是工作总结。比如,年鉴中关于记载兵源的征兵问题,如何把征兵工作的流程、组织人员、组织效果等数字和资料保留下来并不涉密,就需要编辑人员有好的编辑功底。

条目分为综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综合性条目反映年度内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单一性条目一事一条,基本要素齐全。那年鉴的条目如何体现资料性呢?在编纂中,对条目的要求比较高,一是选题选材注重有效性、完整性和新颖、准确、系统。二是有效信息含量高,避免空洞无物和简单重复。要消除部门工作总结、报告痕迹。越是条目类的信息越是具有工作总结的特点,如在编纂的时候特载、附录已有相关内容,后续就不要一再重复。三是坚持“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而道理又能够让阅读者读出来,或是以说明的形式来进行。四是标题中心词突出,题文相符。五是条目排列有序,并避免单个条目构成分目。有的年鉴增加一个“小条目”并小标题,增加的小条目要非常恰当地表述它的条目信息,就会增加很多工作量。过多的条目会让人感觉编纂者的思路和想法太多,阅读体验感不好。同样的,大事记的编纂也非常重要,选录大事要得当,做到重要事项不漏,时间、地点、人物(单位)、结果等要素齐备。大事记和索引编纂起来非常能够体现资料性的特点。

资料的可靠准确是一个基本问题。官方资料也不是说一定是上级主管资料,而是说来自于官方的权威资料。像高校里科研项目的立项,学校里有一条只有获得相应级别的立项才可以获得相应奖励或认可的规定,拿到课题的老师肯定不会漏掉自己的科研立项,他们都会到系统上主动去报,根本不用提示。所以,那个统计肯定相对比较全面。但是有的统计数据就统计不上来,尤其体现在年鉴上。还有一类数据需要去征集,比如我们学校的年鉴就会把各种统计表放上去,各种汇总数据都放上去。基本统计数据要不要体现在年鉴中,比如有的学校把每个学院招的新生和毕业生都放到年鉴里,有没有必要,是值得讨论的。

**本刊编辑:**我们现在编纂年鉴也是为以后的修志积累资料,那就要区别年鉴的资料性和档案的资料性。例如政策规划、报告是否入鉴,如何入鉴?以及哪些可以入鉴,应该放在年鉴的什么部分合适?

**彭勇:**个人认为审核、审议的报告是应该放进去的。像现在教育部要求“双一流”大学必须把学校整个年度的工作总结进行报告。领导讲话需要放进去,并且不仅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的讲话需要放进去,代表的发言也应该放进去。另外,还有单位年度的预算和决算的报告也应该入鉴。特载,指从资料文献上看是重要的,不一定是党委书记、校长的讲话就是特载,重要会议材料也可以收入特载。选用资料是可以有所选择的,尤其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像我们做研究的时候,特别想了解这几年的发展规划、政府的定位,等过了10年、20年之后,你再去看,资料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因为需要的是每一个年度的坐标数字,年鉴应避免使用过于概括性的统计数字。

同时,年鉴附录的学术性价值非常高,所以如何选择、使用非常重要。附录不是简单的统计数据 and 统计表,附几个数据和统计表不是附录,应是非常重要的文件,又不好列在

年鉴正文里,它提供的是关键的、重要的补充信息。像写史学论文,往往高水平的论文大多会充分利用附录。附录虽附后,可是它恰恰是资料中最强的部分,哪些东西能够放到附录里是有要求的,至少可以把今年最重要的文件原原本本地放进去。年鉴中有大量的统计表,很多统计表是不应该放到附录的。《北京海淀年鉴(2018)》的附录,就收录了2017年海淀区人民政府文件目录等指导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很好。高校年鉴的附录其实也可以把校发的文件统一列出来,或者是把党政联席会通过的决定发文,比如我们学院去年上院常委会的就有两个文件,其中一个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决定成立的文件,做论证报告都要把它调出来,像这种文件就应该放在附录中保存。

入鉴图片,选择建议与大事记、特稿等部分对应起来。前述年鉴的两个纲领性文件都提到图片要体现出公益性、资料性。图片所表达的信息一定要清晰完整,如学校重要会议的图片是否有logo、横幅要注意。要不然这幅图往那儿一放,你说图文是相对应的,实际上已经有文字,未必再需要图了。年鉴不建议插图太多,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年鉴上图片的存史功能相对比较弱。尽管我们今天翻旧志的时候很喜欢看图,看当年的情况怎么样,但那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年鉴用大量的图片在提高成本的同时,透露的信息量却非常有限。

**本刊编辑:**关于年鉴存史价值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本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但均站在年鉴编纂者的视角进行探讨。您作为一名年鉴的使用者,认为年鉴的史料价值还需要在哪些地方加强呢?

**彭勇:**年鉴中“历史类”的资料,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上持续地发挥它的资料性。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像政府工作报告、讲话,上网搜一搜全都有,年鉴就不见得要收。年鉴可以提供一个索引,或者引导方向。年鉴要保存比较完整的资料,如一些重大的发展规划,尤其是涉及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这种传承类的资料能够放进去会更好一些。

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变动说明,可能每个单位职能部门的职员变动很大,但是主要的编纂人员,比如领导或者是几个主要领导相对是固定的。在编辑说明里要对比较大的变动,尤其是政策性的变动进行说明。对一个学校来讲,在编写大事记时,一些能够影响学校发展的、调整比较大的人事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人事的管理权等政策,还有职称改革、评审制度改革等较大的改革,要记述清楚,涉及这些内容的重要文件还可以收入附录,因为这些政策和改革在未来几年可能决定了学校的发展。

旧志、实录等文献都非常强调“凡改动者,皆书”。年鉴也应当更加尊重传统历史和现实,使阅读者在翻阅时通过逐年对比看到改动之处。特别强调变动是因为很多常规性的资料,使用者只会关注其中很少一部分,而编者非常清楚整个变动的情况,在编纂的时候把一些重大的改革和变化加上去就提高了它的存史价值。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绵延至今的很多历史资料融汇到年鉴的编写中去,能够记录、更能够体现年鉴存史的价值。所以,从改动的角度来讲,年鉴需增加一些说明,增加能够统领年鉴全文的说明。使用者只需翻看年鉴某一部分,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看到有统领作用的说明。

如《北京昌平年鉴》概述中记载“全区共有37处旅游景区(点)、80余处文物古迹,其



中3处世界文化遗产”,昌平是北京市唯一一个三大文化带建设都有具体内容,并且必须传承保护好文化资源的区。该区内的文化历史地标方面,高标准建设大运河源头白浮泉遗址公园,包括“一泉三庙一楼”整个规划。就年鉴编纂者来讲,接下来对应看到这一年围绕着它开展的重大工作,而后可以与过去一段时间内年鉴的记载进行对比,这样在历史研究的时间链、证据链、逻辑链上就是完整的。

年鉴的大事记从1月到12月是一个时间线。但对高校年鉴来说,学校工作往往是3月开始,自然年度和学业年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些部门、行业可能也存在问题。在大事记的编写上,可能就存在跨自然年度和本单位特殊情况的问题。但既然是按照年度来编写,这个时间点就会被打破。最初列出大事记是为了方便编纂,年鉴定稿的时候再对其做最后的删改,这叫重大线索的引领,如有需要再补充。最先列出大事记,可以首先确定本年度内的重大事件,能够保证重大事件在大事记里不遗漏。在各单位交上材料之后进行编辑加工时,要先把大事列出来,确定有哪些重大工作和重要任务,这是一个编辑的主线。内容编完后进行删改,而后再查缺补漏。大事记篇幅可以适当长点,那它的引领作用可能会有更好的体现。作为使用者,阅读年鉴要认真读一下大事记,了解一年发生多少大事,何事称之为大,有哪些是重要的变革。虽然有些事件本身不大,但影响较大。所以,大事记也是阅读和使用年鉴的一个线索。当然,大事记关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核心要素都有具体要求,就应按要求认主好。

我对年鉴编辑没什么经验,以上主要还是将自己作为一个阅读者和体验者的角度来讲,肯定有很多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范锐超